

文章编号:1004-3624(2023)05-0032-08

· 体育社会学 ·

# 新中国初期群众体育的场域实践与社会效能

——基于1949—1978年环城赛跑活动的考察

郑航

(江苏开放大学健康学院,江苏南京210036)

**摘要:**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人民体育事业,环城赛跑活动应运而生,并逐渐成为群众性体育活动的重要场域。通过文献资料整理,回顾、分析新中国环城赛跑活动的缘起、推广和普及,就1949—1978年间环城赛跑活动与政治、社会的互动关系进行探讨。参与度、影响力不断提升的背景下,环城赛跑演化为政治实践场域,被组织者赋予展示面貌、凝聚群体的空间功能。作为群众体育的重要方式,环城赛跑活动发挥了强身健体、精神激励、科学闲暇、楷模引领等多方面社会效能。虽在特定历史时期存在非理性的价值导向,但环城赛跑的产生及变迁彰显出新中国“社会主义体育”的建构过程,为群众体育事业发展积累了宝贵经验。

**关键词:**环城赛跑;新中国;群众体育;场域;闲暇活动

**中图分类号:**G812.4

**文献标识码:**A

## The Field Practice and Social Efficiency of Mass Sports in the early days of PRC:

### An Investigation Based on the 1949—1978 Round—City Race Activity

ZHENG Hang

(School of Health, Jiangsu Open University, Nanjing 210036, China)

**Abstract:** After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nd the government attached great importance to people's sports, the Round—city race came into being, and gradually became an important field of mass sports. Through the literature, this paper reviews and analyzes the origin, promotion, and popularization of the round—city race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discusses the interac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round—city race and politics and society from 1949 to 1978, and depicts how the Round—city race was held in different historical stage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increasing participation and influence, the Round—city race has evolved into the field of political practice, which is endowed with the spatial function of showing spirit and condensing group by organizers. As an important way of mass sports, the Round—city race has exerted many social effects, such as physical fitness, spiritual motivation, scientific leisure and model leading. Although there was an irrational value orientation in the historical period, the emergence and changes of the race around the city showed the construction process of "socialist sports"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nd accumulated valuable experienc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mass sports.

**Key words:** Round—city race; early days of PRC; mass sports; field; leisure activities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受《共同纲领》“提倡国民体育”方针指导,体育运动与市民生活的关联性不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新中国70年闲暇生活变迁研究”(19BSH001)

**收稿日期:**2023-05-04

**作者简介:**郑航(1992—),男,安徽芜湖人,博士,讲师,研究方向:休闲体育。

断加强,群众性体育活动得到广泛开展。1952年,毛泽东同志“发展体育运动 增强人民体质”的题词成为新中国群众体育工作的发展纲领,1954年中央《关于加强人民体育运动工作的报告》进一步强化了群众体育的政治地位<sup>[1]</sup>。在此背景下,环城赛跑应运而生。1956年北京市举行“胜利杯”环城赛跑,揭开新中国环城赛跑活动的序幕。受经济状况、政治环境影响,环城赛跑历经数次停办、恢复。环城赛跑活动的普及与推广,不仅促进新中国群众体育积极开展,也为社会成员提供了闲暇生活的活动场域。作为1949—1978年间重要的群众体育活动,环城赛跑既发挥了突出的政治、社会效能,也折射出新中国成立后初期群众体育发展的跌宕起伏。有学者指出,新中国群众体育的发展路线有时代环境下的历史必然性<sup>[2]</sup>。还有研究者提出,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群众体育兼具为人民服务的群众体育思想和“革命化”特征<sup>[3]</sup>。既往研究对相关群众体育运动多有探讨,但鲜见与环城赛跑相关的研究。本文在相关历史资料的基础上,从新中国群众体育变迁视角出发,

对不同时期环城赛跑活动的运行状态进行考察,并就环城赛跑活动与政治、社会的互动关系进行论述。

### 1 缘起和普及:环城赛跑的活动参与

新中国环城赛跑缘起于1956年北京市“胜利杯”环城赛跑,比赛由《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新体育杂志》等新闻单位联合举办,活动开展具有较强宣传性。随着北京市环城赛跑以惯例形式固定在每年春节期间举办,活动逐渐成为“一项传统性的群众体育活动”<sup>[4]</sup>。1972年开始,北京市环城赛跑改由北京市工代会、教育局、体委和首都新闻界联合举办。通常而言,环城赛跑保持起、终点一致,以环绕全城的方式进行比赛:如北京市环城赛跑常以天安门为出发点,经由城市道路以环形路线最终折返至天安门广场,赛程一般在10km至13km之间;拉萨市环城赛跑以人民体育场为起、终点,沿环城柏油马路,经布达拉宫等城市地标,赛程为6.4km。

表1 1949—1978年全国重要环城赛跑举办情况简表

环城赛跑活动名称	举办日期	举办城市	参与人数
1956年北京市胜利杯环城赛跑	1956-02-16	北京市	1 450
长春市1956年优胜杯环城赛跑	1956-04-15	吉林省长春市	近2 000
1957年北京市春节环城赛跑	1957-02-02	北京市	1 400多
1958年北京市春节环城赛跑	1958-02-20	北京市	1 120多
1959年北京市春节环城赛跑	1959-02-11	北京市	1 353
1960年北京市春节环城赛跑	1960-01-30	北京市	2 100多
1964年北京市春节环城赛跑	1964-02-15	北京市	833
重庆市冬季环城越野赛跑	1965-02-03	重庆市	3 000多
太原市群众性春节环城赛跑	1965-02-03	山西省太原市	1 002
兰州市职工环城赛跑	1965-02-04	甘肃省兰州市	500多
乌鲁木齐市春节环城赛跑	1965-02-04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	3 700多
北京市第七届春节环城赛跑	1965-02-04	北京市	7 100多
北京市第八届春节环城赛跑	1966-01-24	北京市	1 300多
1972年北京市春节环城赛跑	1972-02-16	北京市	近3 000
太原市元旦环城赛跑	1973-01-01	山西省太原市	14 000多
1973年拉萨市环城赛跑	1973-02-03	西藏自治区拉萨市	690多
1973年北京市春节环城赛跑	1973-02-05	北京市	3 100多
“三八”女子环城长跑接力赛	1973-03-08	北京市	1 600多
青年火炬环城接力赛跑	1973-05-04	北京市	15 000多
1974年北京市春节环城赛跑	1974-01-25	北京市	3 000多
1975年拉萨市环城赛跑	1975-02-11	西藏自治区拉萨市	1 000多
1975年北京市春节环城赛跑	1975-02-13	北京市	1 300多
1976年北京市春节环城赛跑	1976-02-03	北京市	2 500多
1977年北京市春节环城赛跑	1977-02-20	北京市	2 400多
1978年北京市春节环城赛跑	1978-02-09	北京市	近2 000

环城的赛跑路线可彰显出活动的浩大声势、线路的多元设计、观众的活跃互动,发挥群众体育的号召力、感染力、亲和力。我国群众长跑活动历史悠久,元代“贵由赤”迎春赛跑活动即以每年一次的模式举办<sup>[5]</sup>。民国时期,广东省体育协进会举办多次环城赛跑活动,达到“万人空巷之壮观”<sup>[6]</sup>的景象。由于跑步运动群众基础性强,新中国的环城赛跑活动一经推出便广受欢迎,参与人数逐步增加,竞赛成绩不断提升。北京市环城赛跑在1956年举办之初只有1450名选手参加,到1965年上升至7100多名,因群众参与热情高涨,主办方“比赛不得不分别在三个赛区举行”<sup>[7]</sup>。

据表1可以看出,1949—1978年新中国环城赛跑的举办主要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56—1960年环城赛跑的初起发展阶段,从1956年北京市“胜利杯”环城赛跑开始,保持每年举行的持续状态。但受“大跃进”、反右倾错误、三年自然灾害影响,我国群众体育遭遇严重打击,“大多数群众停止了锻炼,一些体育协会自消自灭”<sup>[8]</sup>。1961—1963年间,环城赛跑停止举办。第二阶段是1964—1966年环城赛跑的恢复发展阶段,这段时间随着国民经济的恢复,环城赛跑重新举办,并从首都北京推广到重庆、太原、兰州、乌鲁木齐等多地。随之而来的“文化大革命”使群众体育遭受严重损失,各级各层体育单位无法正常工作,“社会主义体育事业几乎湮没消失”<sup>[9]</sup>。因此,1967—1971年,环城赛跑活动在全国范围内第二次停办。第三阶段为1972—1978年环城赛跑的普及发展阶段,此阶段环城赛跑举办城市增多、项目内容丰富、群众参与提升、社会影响力扩大。虽然“文革”尚未结束,但随着1970年政治形势和社会秩序的相对稳定,群众体育逐渐活跃,甚至呈现“畸形的繁荣”<sup>[10]</sup>。在此背景下,1972年北京市春节环城赛跑重新揭开了环城赛跑在全国范围内持续举办的序幕,并得到更大程度的普及与推广。活动方式上,环城赛跑主要有个人竞技赛和集体接力赛两种。早期主要以个人竞技为主,“文革”期间“环城接力赛”成为主流,并出现“火炬环城接力”的形式。政治运动结束后,环城赛跑回归个人竞技赛为主的活动方式。

## 2 面貌展示:环城赛跑的场域实践

### 2.1 作为政治展示场域的环城赛跑

美国学者杰·科克利(Jay Coakley)指出,运动常被政府用以宣扬价值观和思想,强调与特定社会主导政治相一致的价值取向,并以此构建社会兴趣,

如前苏联政府就利用体育宣扬集体主义及团队精神<sup>[11]</sup>。新中国成立后至改革开放前,环城赛跑经由组织、设计、推广,逐渐演化为政治展示和意识形态宣传的活动空间。活动举办之初,以新闻单位为主的组织方,期冀利用环城赛跑“开展群众性体育运动,扩大体育运动的宣传”<sup>[12]</sup>。受全国性经济困难影响,新中国环城赛跑持续了五年后停办。国民经济逐渐恢复后,重新举办的环城赛跑彰显出党和政府对提升人民生活水平的高度重视。如在旧社会当过长工的76岁老人刘守箴已过上幸福生活,在1965年太原市群众性春节环城赛跑中顺利完成比赛<sup>[13]</sup>。市民的积极参与,体现出社会逐渐摆脱经济困难时期的失序状态。1965年11月,国家体委等六单位发出关于群众体育工作的联合通知,号召全国宣扬不怕冷、不怕苦的精神,积极开展冬季体育活动,项目组织应遵循“业余、自愿、小型多样、因陋就简的原则”<sup>[14]</sup>。受该指导意见影响,1966年1月北京市第八届春节环城赛跑的参赛者由前一年的7100多名锐减至1300多名。同年“文化大革命”的开展使全国体育事业遭到沉重打击,环城赛跑旋即停办。从组构理论(figurational theory)来看,社会是相互依赖、联系的网络,权力通过网络关系流动、转移,而体育作为文明进程的表现因此成为政治实践场域<sup>[15]</sup>。环城赛跑的政治表述建构在参与增多、影响广泛的活动基础上,组织者利用其生活化特质积极展示了党和政府对人民生活 and 体育工作的关怀。

1972年开始,环城赛跑活动重新恢复,并一度呈现繁荣之势。但此时环城赛跑的政治功能被极度强化,意在“使体育更好地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sup>[16]</sup>。这一时期群众体育的繁荣更多来源于政治导向下的强制参与,而非活动的自发组织,环城赛跑成为展示革命精神、意识形态的政治场域。如1974年北京市春节环城赛跑的参赛者有近七成是工农兵大学生和中学生,运动员“在教育革命大好形势的鼓舞下”<sup>[17]</sup>完成比赛;1976年北京市春节环城赛跑中女性选手的广泛参与“反映了经过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首都群众性体育运动蓬勃开展的大好形势”<sup>[18]</sup>。国家通过体育介入社会生活是体育政治化的重要表现,一方面体育能在国家治理层面发挥稳定社会秩序的效能,另一方面由于体育影响力广,参与者易丧失基于思考和判断的“社会行动能力”<sup>[19]</sup>。环城赛跑对政治斗争和革命意识的宣传、展示,使参与者置身于浓厚的政治氛围中,接收政治信息的传递。规制下的政治展示取代了参与者自主

意识的发挥,使相关活动流于形式。如媒体将比赛过程中运动员的你追我赶,描述为“表现了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锻炼的首都青年朝气蓬勃的精神面貌”<sup>[20]</sup>。与此同时,环城赛跑的政治宣传功能也体现到衍生场域中。这一时期环城赛跑举办前往往会安排开幕式或动员会,其中包含大量政治宣传、意识宣教工作。

随着1976年“四人帮”的粉碎和1977年党关于“两个凡是”真理讨论的开展,我国群众体育开始走出畸化、曲折的发展阶段。在此背景下,环城赛跑活动减少了对革命精神与意识形态的展示。1977年北京市春节环城赛跑适逢粉碎“四人帮”后的第一个春节,“参加赛跑的运动员都特别兴高采烈”<sup>[21]</sup>。此时社会对“文革”带来的不良后果已有所反思,人们逐渐认识到社会生产力提升的重要性,有参赛者在环城赛跑中表示要“为社会主义多干些年,为实现四个现代化多出把力”<sup>[22]</sup>。1978年北京市春节环城赛跑进一步还原了活动的体育功能,比赛以“普及与提高相结合,努力发展体育事业”和“刻苦锻炼,增强体质,永攀世界体育高峰”为口号,弱化了革命精神展示的场域功能。此次环城赛跑前召开的1978年全国体育工作会议,是新中国代表最广、规模最大的一次体育工作会议,会上代表深刻批判了“四人帮”的罪行<sup>[23]</sup>。对“四人帮”的批判因而成为该年环城赛跑的政治导向,主办单位强调:“随着揭批‘四人帮’伟大斗争的深入开展,本市广大群众为了适应大干快上形势的需要,锻炼身体的积极性空前高涨”<sup>[24]</sup>。可见环城赛跑作为政治展示场域,其政治功能的发挥与特定时期的政治环境紧密关联,新时期的环城赛跑活动仍发挥展示新面貌的政治功能,所具备的政治意涵存在持续张力。

## 2.2 作为群体凝聚空间的环城赛跑

长期以来,体育运动被国家或政权用以表述集体情感,经组织化设置后,认同感、归属感和团结感在群体成员中得到塑造<sup>[11]</sup>。群众性体育活动往往规模浩大、参与广泛且为人民喜闻乐见,常受到社会的积极支持,运动员能从市民的充分热情中感受到社会群体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新中国环城赛跑举行之初,活动的团结塑造功能就得到发挥,此时的群体凝聚更多来源于民众的自发行为。如1956年北京市“胜利杯”环城赛跑期间,“许多学校的学生和商店的商店的店员都列队欢呼,并且敲锣打鼓助兴”<sup>[25]</sup>。环城赛跑将运动员和普通市民以“跑者—观众”的关系联系起来,呈现出城市社会团结互助的集体精神。在跑者内部,相互的关心、支持、鼓励也推动了参与

成员的群体融入,将运动员熔铸为共同拼搏、奋勇向上的趣缘团体。《体育报》记者施毓忠以运动员身份参加1964年北京市春节环城赛跑,比赛中得到其他参与者的充分关怀,赛后有运动员对其表示:“以后到我家去玩,以后咱们一起练长跑”<sup>[26]</sup>。可见通过环城赛跑凝聚的群体团结既体现于跑者内部,也彰显于社会的互动关系中。当集体主义的意识形态被强调,体育用以塑造群体团结的功能就越明显。随着政治运动的开展和群众体育的推广,环城赛跑作为群体凝聚空间的地位被突出,主办单位期望利用环城赛跑宣传集体主义、占领文化阵地、增强人民团结、共塑革命精神。官方赋予的政治任务和民间的参与热情进一步发挥了环城赛跑的群体凝聚功能,参与者团结友爱的革命精神被着重强调,如1972年北京市春节环城赛跑中,“好多运动员在赛跑中相互鼓励,共同胜利地到达了终点”<sup>[27]</sup>。

一般而言,满足身体条件的基本要求即可报名参加环城赛跑,活动并未对参与对象的职业及所属群体有过多限制。因而随着活动影响力扩大,环城赛跑成为市民社会各条战线广泛参与的闲暇体育方式。同时,环城赛跑作为政治实践场域,被官方赋予凝聚特定群体集体意识的任务导向,尤以“文革”期间针对专属群体的活动设计为代表。1973年3月,北京市举行“三八”女子环城长跑接力比赛,共有1600多名女同志参与和赛跑之中,担任比赛裁判工作的也全是女同志。面向女性群体开展的环城赛跑正值“三八”妇女节,体现党和政府对妇女体育权的高度重视,主办单位也意在通过活动展现“首都妇女朝气蓬勃的精神面貌”<sup>[28]</sup>。同年5月,面向青年群体的北京市青年火炬环城接力赛跑在“五四”青年节当日举行,比赛规模声势浩大,共有15000名共青团员、红卫兵和青年参加了这项活动。为突出革命意志,主办方在赛前号召青年群体要“把革命火炬接过来,传下去”<sup>[29]</sup>。从这两次环城赛跑的竞赛方式上看,接力赛成为主流,更引入了火炬相互传递的任务。主办单位试图将环城赛跑参与者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力求彰显昂扬的革命精神与集体意识。通过接力比赛或火炬传递,参与者能深刻感受到身为群体成员的责任感,使其更为牢固地融入所属群体。德国社会学家刘易斯·科塞(Lewis Coser)认为,当面临共同的政治任务时,群体内部会凝聚成更为紧密的整体,即“冲突唤起同盟”<sup>[30]</sup>。

新中国成立之初,党和政府就将群众体育视为“融合民族关系、建立统一战线的桥梁”<sup>[31]</sup>。如1965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举行春节环城赛跑,有

“各族机关干部、厂矿职工、学校师生三千七百多人”<sup>[32]</sup>参与其中。1973年毛泽东同志发起民族基本政策“再教育”运动,“维护并且保证民族政策能够得到更好实施”<sup>[33]</sup>,这场运动在西藏自治区得到贯彻。1973—1975年,拉萨市在春节和藏历新年期间举行多场群众性体育活动,其中就有市民广泛参与的环城赛跑。主办方强调,“在毛主席革命体育路线指引下,拉萨各族人民积极开展群众性的体育活动,到处呈现一派朝气蓬勃的新气象”<sup>[34]</sup>。参加1973年拉萨市环城赛跑活动的有工人、农民、机关干部、学生、驻藏部队指战员等,分男子个人环城和女子环城接力两种比赛方式。通过运动员的公平竞争、合作比赛及市民的加油鼓励、送茶送水,融洽、和谐的民族团结关系得到彰显。各族同胞在赛前共同练习,赛中相互鼓励,环城赛跑为民族团结提供了活动场域,其中“出现了不少藏汉团结、军民团结的生动场面”<sup>[35]</sup>。

### 3 生活塑造:环城赛跑的社会效能

#### 3.1 环城赛跑的强体健身功能

体育活动最重要的作用就是强身健体,促进神经系统、呼吸系统、肌肉生长等方面的改善<sup>[36]</sup>。新中国环城赛跑设立之初,就将促进身体健康、增强个人体魄的价值导向作为活动最重要的举办目的之一。1956年北京市“胜利杯”环城赛跑的资格认定中,参赛者需符合“18岁以上、经常参加长跑运动、具有一定锻炼基础、身体健康的男性公民”<sup>[12]</sup>的条件。可见环城赛跑的参与资格建立在良好身体素质之上,这对未符合条件的市民从事体育锻炼、取得比赛资格无疑起到激励作用。随着环城赛跑影响力和号召力的增强,期冀参与到比赛中的市民大幅增加,北京市环城赛跑在积极鼓励市民参与的同时,也强调“参加者必须有长跑锻炼基础和医生检查的身体健康证明书”<sup>[37]</sup>。从赛事主办方对参赛者长跑基础和身体素质的重视不难看出,环城赛跑是展示人民健康身心、强壮身体的重要场域。严谨的活动资格审查体现了党和政府对开展群众性体育活动的科学推进,也彰显了社会对环城赛跑活动的重视程度。这一时期人们普遍意识到“人是建设社会主义的最宝贵的资本,健康的身体和坚强的意志,乃是建设社会主义的重要保证,而开展群众性的体育运动则是增强人民体质的重要方法”<sup>[38]</sup>。群众体育的科学开展,不仅有助于增强个人体质、改善健康状况,更对社会主义的生产、建设起推动作用。

尽管1949—1978年间的群众体育不免受意识

形态影响,但在毛泽东同志“发展体育运动 增强人民体质”的体育工作指示下,全社会对体育与人民健康的关联性认知并未改变。新中国群众体育自初始阶段就“从增强人民体质和促进人民健康出发”<sup>[39]</sup>,在此背景下,通过体育运动锻炼身体、获得健康体魄的价值导向被社会普遍接受。环城赛跑公平竞争、竞赛的方式,激发了市民从事体育运动以强身健体的意向。为争取在环城赛跑中取得更佳成绩,有市民自发组织长跑训练和模拟比赛,也有市民“长期坚持跑步上下班,使身体素质大大增强”<sup>[40]</sup>。官方导向和个人意向的结合,促使跑步等运动锻炼被更多市民接纳、选择,进而演化为生活惯习。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认为,惯习(habitus)为社会和个体创造了一种连接方式,将个人的身体状态内化到社会结构中<sup>[41]</sup>。正如布尔迪厄的惯习理论,新中国环城赛跑推动了体育运动的生活化、惯习化。社会成员为参与比赛而进行的长期身体锻炼,使体育强身健体的社会效能持续建构在市民日常生活之中,并不仅局限于环城赛跑的特定比赛场域。

#### 3.2 环城赛跑的精神激励功能

体育精神是指通过体育活动彰显出的信念理想、道德情操,它能够深刻反映体育的感染力、号召力、凝聚力<sup>[42]</sup>。新中国环城赛跑在组织、开展、总结、宣传等工作中,塑造出强烈的体育精神,不仅激励着参赛者英勇比赛,更对全体国民起到精神激励作用。各地环城赛跑举办时间遵循惯例一般安排在春节附近,此时正值我国大部分地区空气湿度最小、体感温度最低、室外环境最冷,参与者需克服外部条件限制,以不畏艰难险阻的精神意志完成比赛。赛跑过程中,“运动员们健壮的体格和勇于克服困难的精神,不时博得行人的赞赏”<sup>[43]</sup>。通过恶劣环境和有限装备塑造出的拼搏精神,成为参赛者勇往直前的真实写照。环城赛跑中运动员遇到困难仍竭力完成比赛的坚强精神,也是媒体的重点刻画对象。如1964年北京第六届春节环城赛跑举办期间,就有跑者在比赛中不慎被他人踩掉运动鞋,导致运动状态受到影响,但该参赛者“果断地把两只鞋都甩掉在一边,光着脚在雪路上继续往前跑,他超过很多人”<sup>[44]</sup>。在艰苦环境中勇于挑战、克服险阻的精神品质,无疑对其他参赛者和观众带来极强的精神震撼。媒体对参赛者不服输的精神刻画符合奋勇向前的时代背景,在社会中发挥了精神激励作用,但欠缺了对运动风险控制的提示。

公平竞赛的比赛精神也通过组织者的合理规划

体现出来。环城赛跑中取得优异成绩的参与者一般会得到奖杯、奖章等物质奖励,具体名次也会通过媒体刊登出来,而荣誉的获得来源于比赛竞争产生的成绩。1958年北京市春节环城赛跑期间,领先者数度更替,参赛者的激烈、公平竞争使“这次环城赛跑的成绩比上两届都好”<sup>[45]</sup>。与此同时,组织者也期望通过环城赛跑塑造出集体主义下的团结精神,因而部分环城赛跑以接力赛的形式举行。1973年拉萨市环城赛跑的女子接力比赛中,参赛者王玉香受团结精神引领,克服身体障碍,“集体主义思想鼓舞着她继续顽强地前进,使她和同组其他三个战友的心紧紧地连在一起”<sup>[46]</sup>。最终,该团队依靠紧密的团结精神和坚强的奋进意志获得女子组比赛第一名。对社会整体而言,环城赛跑彰显的团结精神则超越了比赛本身。比赛后勤工作的开展需得到城市社会的广泛支持,市民的积极参与体现出与运动员共同融入的互助精神。如1964年《人民文学》杂志刊登的散文《飞雪迎春》,就描述了市民与赛跑者互帮互助、紧密团结的互动关系:“在一个雪花纷飞的日子,满街的老少群众为环城越野赛跑跑在后面的送茶送水,呐喊助威”<sup>[47]</sup>。作者以环城赛跑的切身参与,向读者展示了市民对跑者的强烈支持:“一路上,路旁的观众在喊‘加油’,汽车上的乘客也伸出手来喊,甚至值勤的民警,也向我喊”<sup>[48]</sup>。

### 3.3 环城赛跑的科学闲暇功能

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战争时期的体育工作就采取了体育与休闲娱乐相结合的指导思想<sup>[49]</sup>。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积极推动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受物质资源限制和社会风气转型影响,一些具有腐化色彩的娱乐活动从社会闲暇生活中渐趋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契合社会主义发展方向的休闲方式。新中国环城赛跑的萌发正值“第一个五年计划”如火如荼开展,利用体育运动进行休闲,符合这一时期对待生产、生活的昂扬斗志。另一方面,环城赛跑对参与者而言起到科学、健康、绿色、富有活力的闲暇功能。无论是闲暇时间利用还是闲暇心态持有,参与者都以积极面貌从事休闲,这也使社会大众的日常生活呈现朝气。此外,环城赛跑的成绩竞争在赛事外发挥了闲暇体育的持续性。为获得更好的比赛结果,众多市民将练习跑步作为闲暇生活方式,“每天清晨或傍晚,在城区和郊区的马路边,都可以看到不少人迎着寒风练习长跑”<sup>[50]</sup>。由此,环城赛跑超越了赛事举办的时间稀缺性,推动群众性长跑成为市民重要的休闲活动。群众性长跑的身体锻炼、强身健体功效较为突出,利于满足闲暇活动者“自我实现”的

实践目的。

运动员赛跑的同时,市民也在城市中构筑出积极、健康的闲暇氛围。随着环城赛跑影响力扩大、参与数上升、宣传度增加,活动对市民的吸引力也随之提高。且由于环城赛跑路线一般遵循环绕城市的规则设计,所使用的跑道也以城市公共交通道路为主,因而能引发较大范围的市民关注。1956年北京市“胜利杯”环城赛跑过程中,“沿途行人驻足观看,并鼓掌向运动员们祝贺,许多老奶奶也领着孩子们在各自家门口观看”<sup>[51]</sup>。1959年北京市春节环城赛跑不仅有众多市民在沿途鼓掌、欢呼,“一些热心的观众还骑着脚踏车观看比赛”<sup>[52]</sup>。根据康德(Kant)的判断力理论,体育赛事不仅是运动员的竞技场,也是观众通过观看获得审美能力的体验渠道<sup>[53]</sup>。对于环城赛跑的观众而言,虽未能以运动员身份参与活动,但通过观看、欣赏的方式融入环城赛跑,所获得的感官体验与精神意趣都呈现出积极的价值取向。利用闲暇时间观看运动员的奋勇拼搏、持之以恒、不畏艰难,不仅有助于提升观众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还有利于构筑体育审美能力。环城赛跑的观众往往集中在跑道两侧,针对市民观看比赛的热情,主办方有时会设置观礼台等空间,方便观众的加油、呐喊。统一组织的赛事观看符合集体主义的生活导向,观众和运动员共同融入规制下的闲暇空间,逐步构建出“社会主义闲暇”的市民生活特质。环城赛跑也衍生出动员会、座谈会及围绕比赛的文学创作等活动,相关活动一般都以积极、昂扬的精神面貌进入市民闲暇生活。

### 3.4 环城赛跑的楷模引领功能

由于环城赛跑作为群众体育活动能进行广泛的社会动员,一些在环城赛跑取得成绩的参与者被充分宣传,成为引领大众的体育楷模。1964年北京第六届春节环城赛跑结束后,《北京晚报》等媒体对比赛结果和获奖情况进行了报道,坚持长跑锻炼的青年车工崔云海获得冠军,受到现场上万观众热烈祝贺。对体育的坚持不懈,使“这位意志顽强的青年工人跑完全程”<sup>[54]</sup>。从报道不难看出,媒体对环城赛跑夺冠者的描述着重强调意志品质和奋斗精神。1972年北京市春节环城赛跑,铁路工人王福兴取得冠军。赛后,王福兴不畏困难、坚持训练、科学计划的事迹被广泛报道。受时代背景影响,媒体将成绩取得与革命宣传紧密联系,强调夺冠者“年复一年地坚持为革命刻苦锻炼,既锻炼了身体,也磨练了思想”<sup>[55]</sup>。可见通过环城赛跑塑造出的楷模不仅是体育健将,更是政治标兵。报道中也强调,该同志在不

影响工作任务完成的前提下获得杰出体育成就。新闻呈现出夺冠者思想、生产、生活上的全方位优异表现,媒体通过楷模形象的塑造,以期达到政治觉悟引领、工作态度引航、生活方式引导的多重社会效能。

除取得优异名次的运动员外,在环城赛跑中具有象征意义的参与者也得到积极宣传。如顺利完成1965年北京市春节环城赛跑的彭士成同志不仅积极从事体育锻炼,还依靠党员工作带动更多众多同事加入到跑步健身之中,将鼓励他人参与视为“自己的义务和责任”<sup>[56]</sup>。通过组织协调,彭士成发展出了30多名队员的长跑队,促进了集体成员的身体健康和毅力培养。又如1975年北京市春节环城赛跑中年龄最大的跑者丁松森,以66岁的年纪顺利完成比赛。该同志“长年坚持长跑锻炼,保持了良好的体质,十几年来从未上过医院,在革命和生产中生气勃勃”<sup>[57]</sup>。报道体现出体育运动与老龄群体健康保持的紧密联系,并彰显了丁松森老人富有体育精神的个人形象。尽管环城赛跑产生的体育楷模在健身运动、精神意志等方面起到社会推广作用,但其中也存在着部分非理性宣传工作。如1973年拉萨市环城赛跑中15岁的藏族参赛选手其美多吉,虽已“两腿酸痛,头昏眼花”,仍“经受住革命意志的考验”<sup>[46]</sup>,顺利完成比赛。

#### 4 结 语

1952年毛泽东主席为中华全国体育总会题词“发展体育运动 增强人民体质”,这一口号成为新中国群体体育的指导思想,并推动了环城赛跑的开展、普及、推广。自1956年北京市“胜利杯”环城赛跑开始,环城赛跑作为群众体育的重要形式走入人民闲暇生活之中,并经历数次停办和几度恢复。随着参与度提升、影响力扩大,环城赛跑逐渐演化为意识形态展示、社会群体凝聚的政治场域,组织者利用体育活动张力将环城赛跑塑造为政治实践空间。“文化大革命”期间,在其他文化休闲活动被限制的同时,环城赛跑却呈现出繁荣景象,这种表面上的“高潮”实际是政治失序状态下的规制结果<sup>[58]</sup>。随着革命运动的终止,环城赛跑也逐渐恢复常态。纵观新中国成立后至改革开放前的环城赛跑可以发现,作为政治场域的同时,它也承载了人民对群众体育的向往与追求。从社会效能上看,环城赛跑发挥了强身健体、精神激励、科学闲暇、楷模引领等多方面效能,它的发展彰显出新中国“社会主义体育”的建构过程。对中国城市而言,环城赛跑的举办为城市群众体育活动的规划设置积累了诸多经验,如改革开放

后1981年北京马拉松赛的顺利举办,也就得益于前期多次环城赛跑的组织经验。推动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追求的当下,汲取新中国环城赛跑的价值功用,有助于更科学地组织设计群众体育活动,利用体育运动凝聚社会共识,发挥休闲体育“追求人的全面、自由、和谐、平衡以及自我实现”<sup>[59]</sup>的文化价值。

#### 参考文献

- [1] 王学彬,郑家鲲.新中国成立70周年我国群众体育发展:成就、经验、问题与展望[J].体育科学,2019,39(9):31-32.
- [2] 张爱红.我国群众体育参与主体身份的历史审视[J].体育文化导刊,2012(1):44.
- [3] 余宏.新中国建立初期群众体育的历史源流和发展特点[J].沈阳体育学院学报,2019,38(3):92.
- [4] 北京将举行第六届春节环城赛跑[N].人民日报,1963-11-28(2).
- [5] 汪扬.元朝的迎春赛跑[N].北京晚报,1964-02-16(3).
- [6] 环城赛跑新纪元[N].广州国民日报,1930-02-23(3).
- [7] 新华社.北京、乌鲁木齐、重庆等城市举行春节环城赛跑[N].人民日报,1965-02-05(2).
- [8] 李秀梅.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史简编[M].北京: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2002:56.
- [9] 傅砚农,曹守和.新中国体育指导思想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94.
- [10] 谭华,刘春燕.体育史[M].第二版.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7:330.
- [11] 杰·科克利.体育社会学——议题与争议[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52-60.
- [12] 春节期间北京将举行环城赛跑[N].人民日报,1956-02-08(3).
- [13] 郭镇康,刘元晋.省城举行群众性环城赛跑[N].山西日报,1965-02-04(1).
- [14] 新华社.国家体委等六个单位联合发出号召不怕苦,不怕冷,为革命锻炼身体[N].人民日报,1965-11-22(2).
- [15] 熊欢.体育人文社会学质性研究方法及应用[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7:63.
- [16]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促进体育事业蓬勃发展[N].体育报,1974-01-01(1).
- [17] 新华社.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北京上海天津举行春节长跑比赛[N].人民日报,1974-01-26(4).
- [18] 新华社.北京市举行一九七六年春节环城赛跑[N].人民日报,1976-02-03(4).
- [19] 刘桂海.体育政治化:一个“场域”的理解[J].体育学刊,2015,22(6):8-13.
- [20] 新华社.首都举行“五四”青年火炬环城接力赛[N].光明日报,1973-05-04(3).
- [21] 喜气洋洋庆胜利大治之年迎新春[N].体育报,1977-02-21(1).

- [22] 新华社. 首都举行春节环城赛跑[N]. 人民日报, 1977-02-21(3).
- [23] 傅砚农. 中国体育通史(第五卷)[M]. 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 2008:430.
- [24] 吕铭俭. 本市春节环城赛跑昨天举行[N]. 北京日报, 1978-02-10(4).
- [25] 首都各报刊联合举办 1956 年北京市胜利杯环城赛跑[N]. 光明日报, 1956-02-16(2).
- [26] 施毓忠. 在长跑行列里采访[N]. 体育报, 1964-02-20(2).
- [27] 新华社. 首都举行春节环城赛跑[N]. 人民日报, 1972-02-17(2).
- [28] 新华社. 首都举行“三八”女子环城长跑接力赛[N]. 光明日报, 1973-03-09(2).
- [29] 纪念“五四”青年节北京举行青年火炬环城接力赛跑[N]. 人民日报, 1973-05-04(4).
- [30] 陈成文, 陈海平. 西方社会学家眼中的“和谐社会”[J]. 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2005(5):8.
- [31] 郑国华, 祖庆芳, 何平香. 我国少数民族群众体育政策的历史演进[J]. 北京体育大学学报, 2016, 39(2):16.
- [32] 欢欢乐乐过春节迎接生产新高潮[N]. 新疆日报, 1965-02-04(1).
- [33] 伊斯雷尔·爱泼斯坦. 西藏的变迁[M]. 北京:新星出版社, 2015:27.
- [34] 拉萨群众性体育活动蓬勃开展[N]. 西藏日报, 1973-02-01(1).
- [35] 拉萨举行一九七三年春节环城赛跑[N]. 西藏日报, 1973-02-06(1).
- [36] 杨潞然. 多学科视角下的体育人文社会学[M]. 北京:中国纺织出版社, 2018:42.
- [37] 北京春节环城赛跑 30 日举行[N]. 人民日报, 1960-01-07(4).
- [38] 积极开展群众性的体育运动[N]. 人民日报, 1954-02-09(1).
- [39] 张非垢. 群众体育运动的成绩是抹煞不了的[N]. 人民日报, 1957-11-26(7).
- [40] 新华社. 北京市举行一九七三年春节环城赛跑[N]. 人民日报, 1973-02-06(3).
- [41] 魏伟. 近现代西方思想家的体育观[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7:263.
- [42] 翟继勇, 董琴娟. 体育文明探究[M]. 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 2017:38.
- [43] 新华社. 首都举行春节环城赛跑[N]. 人民日报, 1964-02-17(2).
- [44] 环城赛跑花絮[N]. 北京晚报, 1964-02-15(4).
- [45] 首都健儿环城赛跑[N]. 北京晚报, 1958-02-21(2).
- [46] 喜看健儿跑环城[N]. 西藏日报, 1973-02-06(2).
- [47] 缪宗. “风尚新篇”读后[N]. 人民日报, 1964-05-16(7).
- [48] 张庆生. 飞雪迎春[J]. 人民文学, 1964(3):30.
- [49] 党挺. 中国红色体育文化研究[M]. 北京: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 2005:111.
- [50] 春节环城赛跑今天上午举行[N]. 北京晚报, 1965-02-04(4).
- [51] 北京市昨天举行胜利杯环城赛跑[N]. 人民日报, 1956-02-16(2).
- [52] 北京举行春节环城赛跑[N]. 人民日报, 1959-02-11(2).
- [53] 高强. 知觉、判断力与范例——从两种体育审美体验谈起[J]. 体育科学, 2013, 33(5):92.
- [54] 春节环城赛跑今天上午热烈举行八百多健儿大显身手跑完全程[N]. 北京晚报, 1964-02-15(4).
- [55] 本报通讯员. 持之以恒, 刻苦锻炼——丰台车辆段钳工王福兴取得环城赛跑冠军的经验[N]. 人民日报, 1972-06-08(4).
- [56] 马联仲, 何礼荪. 为革命而练长跑——记一位环城赛跑运动员[N]. 北京晚报, 1965-02-05(4).
- [57] 北京市举行一九七五年春节环城赛跑[N]. 人民日报, 1975-02-14(4).
- [58] 孙葆丽, 杨文学, 潘建林, 等. “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群众体育[J]. 武汉体育学院学报, 1999, 33(6):8.
- [59] 史连峰, 吴立娟. 休闲体育与全民健身[M]. 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 2016:15.